

新闻研究资料

第二辑

一九八〇年

新闻研究资料

第二辑

一九八〇年一月

编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

出版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人民日报印刷厂

统一书号：7190·003

定价：0.80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 书 目 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问题讨论集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第一集 0.80元 第二集 1.45元

访日归来的思索 邓力群等著 0.27元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马洪等著 0.30元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理论

王绍飞等著 0.40元

外国名作家传（中）

张英伦等主编 1.56元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一） 1.20元

美学论丛（一） 0.75元

东方文学专集（一） 0.60元

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

0.81元

汉字信息处理 0.56元

成语辨析 倪宝元著 0.85元

语言学译丛（一） 0.85元

历史上的阿拉伯人 0.62元

近代史研究（一） 0.93元

南亚研究（一） 0.62元

世界宗教研究（一） 2.00元

——新华书店发行——



谢老在延安窑洞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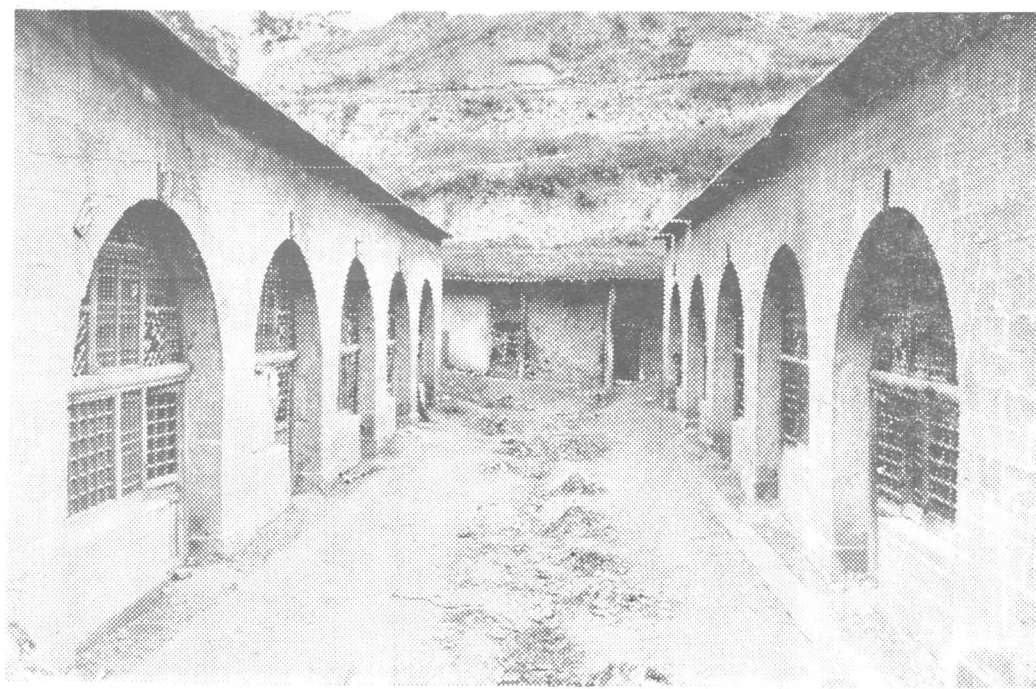


谢老在延安



谢老和徐老在延安

新华社清凉山编辑部旧址，左边一排
第四间为语言广播部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窟窿峰发射机房旧址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王皮湾发射机房旧址



关于我们的报纸

张闻天

我们的报纸，比如拿我们的《红色中华》来说吧，自从改组之后，已经得到了一些进步。它开始组织了一些通讯员在它的周围，登载了各地方各种动员的消息，相当地发扬了群众的积极性与在各种工作上起了部分的推动作用。在编辑方面也起了部分的推动作用。在编辑方面也比较更活泼有生气。因此报纸读者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报纸的销路从不到一万增加到了四万。其它如《青年实话》与《红星》等都是如此。



张闻天同志一九三八年春在延安时摄

但是一般的说来，我们的报纸在为了党的与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而坚决斗争方面，还是非常薄弱的，我们所登载的新闻，常常是一些当地组织所要完成的赤裸裸的数目字，或者是它们的计划与工作布置。比如关于扩大红军的工作，我们的报纸，照例是某某地方的“光荣的动员”，某某地方“正在积极动员中”以及某某地方“扩大红军的热潮”等好听的标题，然而关于这些动员的下文，关于这些工作计划执行的程度与在这一动员中所发生的许多问题，我们的报纸是没有记载的，我们常常满足于一些赤裸裸的动人的数目字，一些一般工作计划与工作布置。但是对于这些记载进一步的考察与检查，关于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因工作计划的流产或工作中发生严重现象而敲起警钟来引起全党与整个苏维埃政府的注意，来采取紧急的办法，在我们的报纸上还是没有。

具体的例子，是关于江西省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江西省委在十月革命节前，曾经决定扩大红军三万五千。后来把这一计划的完成推迟到广暴节。（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日——本辑编者）然而依照最近我们得到军委的报告，在十一月十五号以前，江西集中的新战士不到五千。广暴节前扩大红军三万五千的计划的流产的危险，已经在我们的前面。但是这种危险在我们的报纸上是看不到的。在我们的报纸上照例还到处是“光荣的模范的动员”。比如在十月六日《红色中华》一一六期上，我们看到关于博

生县九月底十天内扩大红军一千八百名的记载。在《红色中华》一二四期上又说到“博生县的广泛动员”，从十月十一号起至十月十七日止，在梅江、流南等五区“七天动员了一千五百八十三人”。只依照《红色中华》这两次关于博生的记载，那它单在十七天内就扩大了红军三千三百八十三人。这不但在十七天内完成了博生县原定计划，而且超过了计划。关于江西其它各县，也是如此，所以依照《红色中华》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非常乐观的结论，就是我们不但完成了我们的计划，而且可以超过我们的计划。然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同《红色中华》所描写的动人的图画，是不相符合的。实际给了《红色中华》的乐观的记者以冷酷的嘲弄。

这是因为我们报纸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下面实际情形，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揭发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一切严重问题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这种报纸当然决不能起为了党与苏维埃所提出的中心任务的实现而坚决斗争的作用。

大部分我们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空洞的浮面的记载。在我们报纸上不容易找到关于一个村、一个乡、一个机关、一个企业某一部分工作的比较有始有终的记载。比如关于合作社的记载，我们只看到“大批群众踊跃加入合作社”的一般记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关于一个合作社的比较有头有尾的记载。我们的合作社到底怎样工作，群众同合作社的联系等许多具体的问题，我们从报纸上都无从知道，报纸也不注意这许多实际的问题，也不提出值得党与政府注意的问题，也不提出对于一些问题的具体意见与具体办法。比如在《青年实话》第二卷第二十八期上，我们看到“宁化青年积极加入合作社”的记载。这里只是说在八月份宁化县少先队加入合作社的钱，共有一千一百元，超过原定计划数目五倍多，所以“真的给了《青年实话》对合作社运动的号召以列宁青年的回答”。但是这些合作社到底开在宁化哪里？合作社的营业与组织怎样？那都无从知道。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在《青年实话》上没有一个字讲到过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宁化合作社。这种流水账式的记载，请问在为了开展合作社运动而斗争中，到底有什么用处。

把党与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最清楚的放在我们报纸的前面，继续不断的为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应该是我们报纸的基本工作。在这一方面，只有我们江西省委的《省委通讯》有了初步的成绩。这是值得指出的。

比如在目前我们进行到明年一月一日止扩大二万五千的红军的突击运动中，我们的报纸不但要记载各机关突击队的下乡，而且要记载这些突击队怎样工作，这些突击队工作的成功与失败，以及成功与失败等原因，不但要记载某区某乡有了多少人报名参加红军，而且要记载这些报了名的是否真正集中，与不能集中的具体原因，以及集中时动员情形。真正赞扬能够完成计划的某一突击队，把一定数量真正送到了补充师的突击队，在毫无成绩的突击队前面提出警告，以引起党与军事机关对于这一突击队的注意与及时的补救办法等。只有这样做去，报纸真正尽了为党与政府的任务的实现而斗争的作用。

其次，应该特别指出的，在我们报纸上空洞的议论与叫喊多于利用具体的材料来开展斗争，来改善工作，来教育广大的群众。

在我们的报纸上差不多经常议论到应该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然而关于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的记载，则是少到再不能少的地步。我从《红色中华》一〇六期，翻到一二八期，似乎只有两个关于官僚主义的事实

的新闻，而且这些新闻都登在最不重要的地位，这些新闻都是拿旁观者的笔调随便写来充充报纸的篇幅的。除了空喊反对官僚主义而外，我们很难找到真正的有名有姓的官僚主义者，他的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与他的官僚主义在群众中所发生的恶果的记载。如若这样去空洞的反对官僚主义，那不但官僚主义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失，而且官僚主义者也会双手赞成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这种反对决不会影响他自己的官僚主义。

如若我们红星报从第一期翻到第十六期，那我们只找到第九期上一个地方说到了博生第九兵站的官僚主义。在《青年实话》最近十期上，则可以说没有什么官僚主义。

奇怪的现象！到处都在喊要打倒官僚主义，但是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在我们的报纸上却很难找到。

在反对浪费，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开小差，反对反革命活动以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常常看到空喊多于具体事实的揭发。这种空喊不但不能打击罪恶的负责者，不但不能改善实际工作，而且也不能教育群众。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论我们的报纸的性质》一文中说到：“我们还没有同具体的罪恶的负责者作切实的无情的与真正革命的战争。我们还很少从生活各个方面利用活的、具体的例子与模范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时期的报纸的主要任务。我们对于工厂内，农村中，军队内日常的生活方面还很少注意，而正是在那里建设着新的，在那里特别需要注意公开的，社会的批评，打击混蛋分子，号召学习好的”（列宁选集第五本第一七四页）

列宁这种批评，对于我们的报纸也是完全正确的。反对官僚主义必须把那些官僚主义者从他们的安乐窝里拖到苏维埃的舆论的前面，在全苏区的群众前面，具体的指出他们的一切错误事实，号召群众起来同这些官僚主义者做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打击与消灭官僚主义，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实上来教育广大的工农群众。

一些阶级异己分子，一次两次的领导新战士开大差，或是坐在我们的军事机关里进行着破坏红军的工作。这些罪恶分子的罪恶，我们很少在报纸上揭发出来。甚至象《红星》报这样有威信的总政治部的报纸，也很少这类记载，甚至可以说简直没有。因此，这些反革命分子能够安心的在我们的队伍内活动，而不受到我们最严厉的打击。

我们的《红色中华》曾经做过了很大的节省运动，但是在它的篇幅上，对于不能容忍的浪费，贪污腐化的具体斗争却是没有。

我们对于破坏与动摇苏维埃政权的一切不能容忍的现象与混蛋分子，实在太容忍了。我们对于这种现象与分子默不作声。这样的报纸，当然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真正革命的报纸、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的任务。

列宁在同一文章上说：“在国有之后把那些还是那样纷乱、衰落、胡闹、偷懒的工厂，放到黑板上，这类工厂在那里？没有看到。但是实际上这类工厂是有的。如若不同资本主义传统的保存者进行战争，那我们不能完成我们的责任。如若我们沉默，容忍这类的工厂，那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揩台布。我们不会在我们的报纸上这样进行阶级斗争象资产阶级那样去进行。请回想一下，资产阶级怎样在报纸上打击它的阶级敌人，怎样讥笑他们，怎样污辱他们，怎样从光天化日之下驱除他们，而我们呢？难道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在于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受那些顽固地保

持着资本主义的传统（习惯）的一些工人的阶层、团体与一小群人的侵犯吗？这些人还是象从前那样看待苏维埃政府，给‘它’（指苏维埃政府——洛甫注）少做些工，做得坏些，从‘它’那里多偷一些金钱。难道这样的混蛋，就是在苏维埃印刷厂，在沙尔莫夫与浦记洛夫等厂的工人中还少吗？但是我们捉到了几个，揭发了几个，把几个放到了耻辱的柱上？

“报纸关于这个保持着沉默，如若写的时候也是官样文章的写法，而不象革命的报纸，不象阶级专政的机关报，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出一切资本家与保持资本主义习惯的游手好闲的家伙的抵抗，将用铁的手腕打的粉碎。”（同上）在我们的苏维埃机关内，苏维埃国家企业内，象列宁所说的这类保持着旧时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传统的家伙，当然不在少数，然而我们的报纸保持着沉默。甚至在我们全总执行局的机关报《战斗》上，也很难找到关于一个国家企业内破坏劳动纪律，使生产力低落的个别坏蛋分子。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劳动法劳动纪律的话，然而对于这种事实则默不作声。这种情形，请问还能继续下去吗？

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浪费者，反革命异己分子，破坏国家生产的怠工工人等，必须给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使他们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的面前受到唾骂、讥笑与污辱，使他们不能在苏维埃政权下继续生存下去，这样来改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来教育广大群众。

虽然这不是说，我们只要把不好的现象揭发出来，而抹杀好的模范与光荣的例子，这类好的现象，在我们苏区是数不尽的。我们要尽量的散布每一新的经验，新的模范，赞扬在军事、政治、经济、劳动的各个战线上的英雄。在这一方面，实际上，我们的报纸同样的做得非常不够。正因为我们把许多不配做模范的例子也当做模范，很坏的动员当做光荣的动员，所以真正的模范与光荣的例子，得不到应得的地位，而且反而埋没在许多不确实的“模范”与“光荣”的纸堆中了。

象我们那样的记载，也没有法子使读者知道到底我们的“模范”与“光荣”在那里。在我们报纸上很难找到有系统的关于一个机关、一个企业、一个工厂、一个乡、一个支部的某一工作的模范的通讯。我们只要在那里看到扩大了几个红军，我们立刻笼统地给他一个“模范”的名字。我们往往拿一些表面的数目字来决定模范与落后，对于工作的实际的内容与质量，我们照例是不注意的。但是工作的模范正是决定于工作的内容与质量。

我曾经在另一地方说到，我们只说要学习兴国与才溪区的许多工作的模范，但是对于这些模范，我们从未研究过。在我们的报纸上却天天是模范，然而模范的实际内容，却是谁也不知道。每一个买公债票退还公债的人都列名红板，请问这样的红板还有什么价值！

列宁在同一文章上又说：“少些政治的清谈，少些知识分子的议论。更同生活接近些，更注意些工农群众怎样在实际上的他们的日常的工作中建设了某些新的东西。更多的去检查这些新的东西中有多少是带有共产主义意味的。”（同上）

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真实上加以什么粉饰。在苏维埃革命中，我们有着数不尽的群众的英勇与光荣的壮烈的事实，我们有着新社会创造中一切伟大的设施与工作，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弱点，还有许多不能容忍的现象，还有许多坏蛋分子在我们的内部进行破坏工作。我们需要我们的报纸，如实的反映出苏维埃的实际，真正为党与苏维埃政府所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我们不是沉醉于自己美梦的空想家，我们也

不是由于我们自己工作的缺点与错误而陷于悲观失望的无气节分子。我们是从目前的现实出发，依照我们的路线改造这一现实而稳着脚步前进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要使我们的报纸达到我们上面所说的任务，我们必须纠正在我们工作中的自流现象与无组织性。我们报纸的记者，大都是依靠于外来的新闻来决定报纸的内容，而这些通讯员是依照他们自己的志愿来写他们的新闻的。对于新闻材料的采访与选择，我们报纸的领导者所起的往往只是消极的作用。去组织与采访一定的新闻材料，领导这些通讯员去完成一定的任务的工作，还没有开始。

我想在我们报纸下面应该有一定数量的采访员。这些采访员分别同苏维埃政府（如《红星》）等所派出的工作团出发，在工作团整个工作的过程中给他们自己的报纸通讯。这样的通讯员对于我们特别宝贵的。同时由于报纸方面的提议，可以为了某一个问题的组织对这一问题有关机关人员的工作团出发。比如，在于都发生过很多群众逃出白色区的事件，我们的报纸得到这一消息后，就应该立刻发起由党、政府、青年团、工会等共同组织工作团去当地考察并解决这一问题。这种办法在苏联《真理报》、《新闻报》等都是应用的。

我们的《红色中华》听说现在有了四百个通讯员，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对于通讯员的领导与组织作用却是极端的薄弱。因此这些通讯员的通讯也是千篇一律，不能起很大的作用。对于通讯员的教育，我们也常常拿难懂的空洞的名词（如“唯物辩证法”、“归纳法”、“统计法”、“演译法”等，见《红色中华》《工农通讯员》第四期，来代替了具体的通俗的实际的教育。具体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进行通讯员的工作。

同时，当然我们还应该指出各级机关对于自己的报纸的注意，领导与帮助是极端不够的。比如《红色中华》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但是中央政府对于《红色中华》中除了要它登载中央政府的文件之外，可以说没有什么帮助与领导。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但是中央政府不去利用，不去领导，这是不能容许的现象。比如最近各地苏维埃政府的选举运动，中央政府是否拿各地选举运动的实际情形，供给《红色中华》，经过《红色中华》来做极大的动员呢？完全没有！不但如此。中央政府一方面不去利用自己的机关报来进行选举运动，而自己却另外出版一种《选举运动》的刊物。它的作用也不过是把油印的文件拿来铅印一下，就算完事，对于选举运动的领导依然没有。结果这个刊物也不能不无形中夭折了。

应该指出的，在中央政府中有些个别的同志，以为利用自己的机关报，就是利用它来登载自己油印的文件，关于如何经过报纸来进行活的领导，却是不了解的。所以《红色中华》一直到现在名义上虽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但是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目的。这不能简单的责备《红色中华》，中央政府也要负很大责任的。我们不但要使我们的报纸成为集体的宣传者，而且也要它成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把列宁这句名言拿来一千零一遍的背诵，并不能在实际上真正转变我们的工作。这里同样的需要坚持到底的布尔什维克的具体的实际工作。

至于报纸排印得醒目，文字的通俗，发行的深入群众，这许多问题，我想是同志们所容易了解的，我在这里不再多说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

（本文刊于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十八期，署名洛甫，当时张闻天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宣传教育工作。——本辑编者）

邓中夏与《工人之路》

薛豪卓 李湘俊

一九二五年六月，随着震撼世界的省港大罢工的爆发，一份指导工人罢工斗争的报纸——《工人之路》(特号)诞生了。主编这份报纸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宣传部长、罢工委员会的党团书记兼顾问邓中夏同志。

工人之路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计划在全国发行的一份日报，因筹备未周，尚未出版。

六月十九日，香港罢工开始了，十几万罢工工人陆续回到了广州；六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沙基惨案。上海南京路上的血迹未干，珠江岸边，中国人民的鲜血又流成河。“为被杀的同胞报仇！”“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愤怒吼声回响在南海上空，罢工怒潮席卷珠江两岸。为了及时指导这场伟大的罢工斗争，中华全国总工会便决定以特号的形式提前出版工人之路，主编的责任便落到了邓中夏同志身上。

六月二十三晚上，邓中夏办公室里的灯光彻夜通明，从工人之路的版面设计到报头题字，从有关重要文章的撰写到稿件的校对，都是他亲自动手。

第二天清晨，一张四开四版的日报，满载着省港罢工工人的怒吼飞向四面八方。

它旗帜鲜明，尖锐犀利，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并随时揭露其阴谋，使其原形毕露。

在我罢工工人的沉重打击下，英国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经济损失每日达四百万元，而且使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粮食断绝，物价飞涨，街道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面对这岌岌可危的局面，沙面英国领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但又不肯当面认错求和，反而于七月十一日写来一封威吓信，说罢工不仅碍及中国人粮食的供给，且“自行剥夺做工及谋生之机会”。邓中夏同志看过来信后，识破其伎俩，立即写了《红毛鬼乞和之初步》、《香港红毛鬼用错了心机》等短评，在工人之路上登了出来。文中辛辣地嘲讽道：“哈哈！红



邓中夏同志

毛鬼呵！我们告诉你，我们的北江、东江本年丰收，湖南已有米来，上海亦有米到，至少半年以上，不愁粮食告缺，倒是粒米不生的香港、沙面，我们倒很担心。轮船停驶，饿死的恐怕不一定是中国人罢？哈哈！红毛鬼呵！你以失业为恐吓吗？我们广东政府现正着手于黄埔开埠，兴筑马路，开设工厂，延长铁路种种，本国经济建设的工作，一二十万人还嫌少呢。倒是香港、沙面，恐怕不到数月不免有野无人烟的悲凉景象罢！红毛鬼呵！我们都知道你措辞的用意，你想向我们叩头乞和，又不好说自己受苦，自然说一句碍及中国人粮食的堂皇话，于自己体面也好看。你想向我们叩头乞和，自然希望我们团结分离，故以失业为恫吓，好减少我们对付你们的力量。哈哈！红毛鬼呵！其实你的肝肺心肠，我们已用X光线一眼看穿了。”真是言辞犀利而幽默，鞭辟入里，恰中要害。

不久，英帝国主义的外交大臣张伯伦又叫喊要以十万大兵来进攻中国。中夏同志闻讯后，嗤之以鼻，并写了一篇《欢迎英国十万大军进攻中国》的评论，文中分析了英国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指出这不过是纸老虎借以恫吓中国人民的伎俩。后来事实证明，英国不仅不能派兵来华，甚至把香港的部分驻军也调回国内去镇压工人运动去了。当时，在罢工工人中传开了“邓顾问智屈张伯伦”的美谈。

为了说明罢工斗争给港英当局带来的巨大损失，中夏同志还特意在报纸的显著地位，每天用花边围上大号字排出“帝国主义者的损失”，以每天四百万元计算，天天累计出帝国主义损失的数字，用以鼓舞工人坚持罢工斗争。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香港总督史塔士因“办事不力”被英国当局撤职了。这个家伙早在香港罢工开始时，横暴桀傲，不可一世，曾四处扬言：“蠢尔华人，竟敢罢工，余誓在余任内亲自解决之”。罢工两个月来，斗争方兴未艾，而史塔士却被革职了。消息传来，无不高兴。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同志立即写了短评《香港总督撤任了！》发表在八月十九日的工人之路上。邓中夏同志也别出心裁的在这天的报纸上刊登了史塔士的一张头像，横批写着：香港总督史塔士留别纪念。两侧还配有一幅对联：

史塔士曰：“蠢尔华人要罢工，待我收拾然后走”；

罢工工人曰：“愧未归来见君行，且在省城饮贺酒”。

罢工工人看了人人拍手叫好，个个扬眉吐气。

邓中夏同志就是这样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大长了罢工工人的志气。

邓中夏同志对敌人是如此辛辣嘲讽，揭露无遗，而对罢工工人却又是那么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为了打击工贼，促成香港总工会的成立，以保障罢工斗争的胜利，邓中夏同志接连写了四篇短评，发表在工人之路第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一四九期上，文章短小精悍，用语恳切，步步深入。

第一篇题为《怎样保障罢工胜利？》文中首先指出，据现在各方面的情形看来，大约“罢工胜利”是不成多大的问题了，成问题的倒是“怎样保障罢工胜利”？他举了一九二〇年海员罢工的教训，说胜利的条件是订立了，



但是只成了一张废纸，而一直未履行。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我们应该怎样来保障罢工胜利呢？邓中夏同志在文中用启发式的口吻写道：“今晚大家都过细想一想，兄弟也想一想，明早我提出办法来，看你想的和我所想的同与不同？”

第二篇题为《炮台政策》，文章深了一层，指出“要保障罢工胜利，只有我们采取炮台政策”，并具体谈了炮台的厉害。可是保障胜利的炮台是什么，怎样来建筑？中夏同志又卖了一个关子，写道：“诸位工友今晚再想一想，看你所想的与我所想的究竟同与不同？”

第三篇题为《保障罢工胜利的两个炮台》，首先说明这两个炮台一是后方的广东革命政府，这个炮台快完工了；另一个是前方的香港统一总工会，需要赶快建筑。但是怎样建筑呢？中夏同志又要大家再想一想。直至第四篇《前方炮台怎样建筑？》才最后提出自己的主张。就这样，循循善诱，步步深入，使工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大家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阅读着，思考着，研究着，夜深了也不肯离去。在这阅读和思考中，也就提高了大家的认识，统一了大家的思想，终于促成了香港总工会的成立。

据当时的老同志回忆，中夏写文章喜欢用十行纸，拿毛笔写，字写得丰润劲逸。每写到好人好事或得意之时，总是带着笑容，用三个手指捏捏鼻子，表示出很高兴的样子；写到敌人的残酷或对敌斗争，却又怒形于色，有时还拍案骂几句。文章写了并反复修改。他喜欢用些通俗成语，有时也用些文言，因为省港识字工人多是读过两三年私塾，对文言较能了解，所以在文中杂点文言，工人更易懂得，但他为《人民周刊》写文章，则多用白话文，可见他是处处为工人群众着想。

中夏同志常对协助编辑的几个同志说：工人之路是办给工人看的，他们文化较低，文章要尽量写得通俗易懂。一次，中夏见他写的《呜呼廖先生之死》的评论中，“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反革命派要置廖仲恺先生于死地”一句里，把“置”字印成了“致”字。又一次，他看到他写的《一厢情愿》中，把“厢”字错印成了“向”字，他再也忍不住了，便把负责校对的几个同志找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道：“搞校对和其他工作一样，来不得半点粗心大意，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求更精细。深奥的文章工人看不懂，有错字的文章工人也会看不懂，甚至还会歪曲原意，从而造成他们思想上的混乱。我们的报纸是宣传的工具，战斗的武器，一字一句，甚至一个标点都马虎不得，忽视不得。”随后他把“一厢情愿”这句成语的出处讲给大家听，说明为什么不能用“向”字的理由，使同志们很受教育，以后校对时，也就更认真负责了。

正因为中夏同志心里装着工人，处处为他们着想，因此，工人之路越办越有生气，不仅能紧密联系实际，战斗性很强，而且语言通俗易懂，版面也十分活泼。后来还特辟了《工人俱乐部》、《小孩子周刊》、《吼声》、《小言》等专栏，发表工人的言论和宣传罢工斗争的文艺作品，深受工人欢迎，每期报纸一出，人人争相阅读。

工人之路特号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创刊，至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停刊，共出五百五十三期。这上面凝聚了邓中夏同志的不少心血，它真正的照亮了工人之路。

闪光的晶石

——读谢老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杂文《一得书》

王 敬

《一得书》是谢觉哉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所写的杂文，笔名焕南，时间是从一九四二年四月到同年十一月，共七十一篇，先后发表在第二版上。在第一篇前面作者这样说：“大文章不易写，只好写点小文章。整个意见不易提出，零星意见却是有的。《一得书》是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但有时并没有一定千虑，就把它写出，所以也不一定是‘得’。就这样写下去吧！如果有材料而不害病的话。”



谢老在工作

当时谢老的身体健康状况

不好，患高血压、心脏病，开头他一直坚持着隔一天发表一篇，后来有时隔三、五天写一篇。毛主席对谢老的身体十分关怀，九月，给谢老的信里提出：“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极宜有所调节，文章亦不可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谢老给毛主席的复信说：“示悉，于公于私都需要活下去，至少还想活至十年以上。然鉴于凌波的死，知道活下去也不易。上次到你处，不知道路上有那么热，脑筋昏胀了，你似乎看了不对，叫我睡，我还能马上静下来，否则就要发生死。……”他接受了毛主席的劝告，

到十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则《焕南启事》：“《一得书》开头就这样说：‘就这样写下去吧！只要有材料而不害病的话’，现在材料写不完，可是身体有时不大听命，遵医生的嘱，暂搁笔一月或两月，贱躯稍可，当即续写。”果然，到十一月十一日，《一得书》重新同读者见面。但终因疾病缠身，不得不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结束。

解放日报是在什么情况下刊登的《一得书》呢？那是在一九四二年改版时，四月一日发表了改版社论《致读者》，四月九日就出现了这个专栏。这次改版，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打破王明教条主义的

精神枷锁和资产阶级报纸陈旧框框的斗争，它确立了无产阶级的办报路线和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勇于改革的精神，是一次从内容到形式，从政治到技术的彻底改革。谢觉哉同志正是按照中共中央《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所提出的要求：“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写出了题材广泛而深刻的《一得书》。他当时既是边区党政领导人之一，又是报纸的专栏作家，足见他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和党报工作。《一得书》里有丰富的知识，精辟的议论，善意的启发，尖锐的批评，它在当时的杂文中具有一种新的形式和内容。篇篇段段，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爱。批评和揭露，也都是满腔热情的。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许多人写建议，反映情况，提问题请求解答，它与人民息息相通，它使读者深受教益。这个专栏，密切了党报同人民之间的联系，提高了广大读者的思想水平，它是延安精神的结晶，是一颗闪光的晶石。

“把骨头硬起来”

《一得书》的第一篇就是《把骨头硬起来》，可见谢老对于硬骨头精神放在何等重要地位。他颂扬那种拥护真理、为真理而战斗的人，教育人发扬这种革命精神。

《把骨头硬起来》一文，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写的是延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认为市府的职权低弱，要求边区政府提高市府的职权。谢老看了这段消息以后，颇有感触。他首先讲了一个故事：汉朝有个刚正不阿的京兆尹，有一天把皇帝姐姐的姘头在大街上打了一顿屁股。公主哭诉于皇帝，皇帝就召京兆尹谴责他，京兆尹说：“我没有

错，我是执行皇帝的法令。”皇帝说：“你虽然没有错，但是你得罪了贵人，也应该磕个头。”这个京兆尹不肯磕头，硬起颈骨，几个人压也压不下，皇帝怕对不住姐姐，就说：“原来这个家伙有病，颈骨硬了。”古话叫“强项”病，就是颈骨不能转侧。谢老说：“皇帝时代，尚可‘强项’，何况乎民主的延安？”他认为：制订法律要慎重考虑，制订以后要宣传，特别是要坚持。他说：“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说的情，不理。‘硬起颈骨来’，做它几次，威信建立了，人们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了。”

身为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同志，是这样刚正不阿地支持延安市政府，“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说的情，不理。”这两句话，如宏钟震响，回荡云霄。震人耳鼓，醒人心灵，使人想起了京戏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气概。包龙图只是一个人，而谢老这里提倡的是全党都要有这种作风，要保护法制，不畏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需要具有敢于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世代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只有如此，才能使党内正气凛然，才能孕育出革命的社会风气。

遇有刚正的人，谢老就表扬，就提倡。边区参议员李丹生，北洋军阀时贿选，老人不屑与，国民党统治时，和时流搞不来，自己耕田度日。共产党到了延安，人民选他作参议员，他热心报告民间疾苦，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谢老十分赞赏老人，在老人八十生日时，特意写了《寿丹生老人》一文，誉之为“穷且益坚，老当益壮。”

《一得书》中颂扬对敌坚贞不屈的硬骨头精神的文章，是屡见不鲜的。在《忆叔衡同志》文章中最为突出。谢老和何叔衡同志是同乡，与姜梦周、王凌波同志并

称为“宁乡四髯”，他们一同参加革命，感情很深。谢老说叔衡同志“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的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前面。”一九三四年九月，谢老与叔衡同志最后一次分手，到一九三七年在党的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对牺牲同志志哀，毛主席念到何叔衡同志名字时，谢老十分震惊，“顿时脑子里涌现着叔衡同志临死时的声音与容貌的倔强样子”。叔衡同志的死，当时有两种传说，一说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他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被杀害。一说被包围在山上，敌人逼近了，警卫员劝他走，他说：“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当即掏出手枪自杀了。谢老说：“‘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这话是和我说过的，且正合乎叔衡同志见危不乱的果决精神，所以后一说很可信。”他还回忆起毛主席曾说过“何胡子感情一堆”的话，他写道：“不是一堆骨和肉，而是一堆感情，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它感动。叔衡同志确实如此。他的感情是统治在高度的正义感下面的。”

如何造就成为伟大的革命者，怎样才能具有硬骨头精神，谢老在《此心光光地》一文里，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阐明了共产党人同历史上、社会上的好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此心光光地”这句话，是王阳明临死的时候说的，“光光地”是说心上无毛，俗话管“歪念头”叫“心上生毛”。谢老认为：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毛的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是毛的现象，把这些心上的毛连根拔掉，就能够最诚恳、坦白与愉快，遇到需要牺牲的时候，能够愉快地视死如归，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原因就是心上没有毛。他还在《拂拭与蒸煮》一文中说过：壁镜挂久

了，不大明亮，以为原来如此，偶然把鸡毛帚子一触，发现一道光明，你就知道不去拂拭是误事的。不能主观地把自己看做“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而应“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心上没有毛”，“挂久了的壁镜”，谢老的比喻多么生动、形象，是诗的语言，又是政治语言。这就是要求共产党员注意改造自己，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一致，以至溶化。当党的利益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甚至生命。这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原则，坚持真理，都能把骨头硬起来。而报纸的宣传，就应该让这种精神跃然纸上。

眼睛向下 耳朵向下

谢老把能否密切联系群众做为鉴别干部的首要条件。他提出怎样才算好干部？“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怎样才是与群众密切联系？“要每时每刻都注意群众的利益，深知群众的情感、情绪和需要”。他在《笔记摘要》里写道：“鉴别干部——没有把这——与群众密切联系——做为首要条件。因此，原来是群众运动里产生的，有的逐渐和群众隔离，原来就颇少接近群众的，更没法子深入群众。逐渐，群众不把党看成是他们自己的，而看作和其它党派一样。站在旁边，也可以站在对抗。……我们要不丧失力量而成为永不可战胜者，定要在这一点上警惕而且努力。”

这里把党和人民、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讲得既实际又深透。然而，这个道理，有些人口头上承认但实际做起来却很不容易甚至另是一样。当时有一个派到区里工作的同志，给谢老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说，成天有人到他那里谈问题，打官司，

婚姻问题，打架，动员、摊做鞋子（给驻军），过去的征粮纠纷……等等，争争吵吵，炕上铺上，尘土烟灰，不一而足。他一早起来，把被子一滚，象一个十足的陕北老乡了。每天床板上要清扫两次，有时还在毯子上捉几个虱子。话言话语，流露出没那么高兴的样子。谢老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写了《怎样做县长（五）》，议论这件事，没有批评，而是鼓励，说：“‘官’的炕上布满老乡的尘土、烟灰、甚至虱子，可谓‘亲民之官’了。”“我们的政权工作者，不能仅仅象古代的清官，‘请问下民’就够了，而是要和民众打成一片，时刻替群众着想。”而且说：“领导群众抗战，群众的生命就寄在我的身上；领导群众建设，群众的饱暖，就寄在我的身上；领导群众办教育，群众的贤愚，就寄在我的身上。还有，谈问题，打官司等，当县长的稍为轻率一点，疏懒一点，可以使得群众吃很大的亏。老话说：‘公门好修行’，公务人员多用点心，群众即可少受些困难。”

这精辟的议论，既说明了革命的官，要高于历史上的清官，更指出了革命的官肩上的重任，是群众生死存亡、悲欢乐所系，一点也轻率不得，疏懒不得。谢老对党员和支部也在这方面提出要求：必须每个党员时刻注意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然后党才和群众联系、接近。党员才和群众中的一般好人不同，不是偶然的善念，不是见近不见远。在《语必惊人》一文中，他要求支部要“眼睛向下，耳朵向下”。他说：“眼睛望着天，看不见地下的事，地下不是没人说话，又因为耳朵向上，装做没听见。边府上千的工作人员，都是为革命而来的，对革命很关心，然而我们的耳朵没有张向他们那边。支部的眼睛耳朵不向着党员群众与非党群众，于是党与非党群众的眼睛耳朵也不为我所用了。”批

评十分中肯，语言又非常生动，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从群众中集中上来，反映到报纸上的。

在五月份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高利盘剥者用贱价向农民买未成熟的新粮，谢老想起了一首古民谣：“二月卖新丝，五月卖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写了《探卖粮》，说这是剜老百姓心头肉的大事，应该替他们想办法。“光是严令禁止，怕为效不大”，他提出：除发放农贷以外，银行、合作社和国营商店，在政府监督下，向农民预收新粮，做到国家和农民都不吃亏，注意用经济办法解决经济问题，同时对高利盘剥者进行批评。他看了春耕工作报告中缺少喂牲口的草，就写了一篇《大问题！》；为提倡发展牲畜，写了《牲口问题》；为解决女孩子上学问题，写了《记一女教师同志的谈话》；听到农村买卖婚姻的反映，写了《娶不起老婆》，志丹县有人写信说农民中迷信活动坑害人，写了《农村的耗子》。这些杂文，不说大话，不讲空话，还为群众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总之，《一得书》表达出谢老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也体现了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

解放日报在改版以前，对整顿三风的宣传，很不得力。改版以后，改变了这种状况，坚持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针。《一得书》紧密配合并推动了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理论与实际脱离，所学与所用脱节的严重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每篇都有自己的新鲜见解。他反复强调生吞活剥地照搬外国，是不能在自己基础上创造出新鲜的东西的。抗战刚开始时，在一个讨论抗

战问题的会上，留学外国的博士，都能把留学所在国的理论与实际说上一套，可是一说到中国，就没有多少话了，抗战时期应该怎么做，就更说不上。谢老说：“不是学外国的东西学坏了，而是本国的东西晓得太少，新和旧联不起来。”

对资本主义的东西，固然不能生搬硬套，就是把马列主义当成宗教教条看待，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毛主席曾号召过要对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做启蒙工作。谢老的《一得书》就做了不少启蒙工作，在《理性与感性》等文章里，都对这种人进行了批评帮助。他认为：如果只记着前人所抽象出来的知识，不去证实，和机械地由一种条件搬到另一种条件去，或者拿前人所抽象的作依据而更抽象一下，“这样的理论，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匪浅，容易把革命弄坏。”他非常欣赏一个德国牧师对中国共产党做农民工作的评论。那个牧师是从江西苏区出去的，他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马克思主义很深奥，文化低的中国工农，怎能和他们讲这些个？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真妙，他不对农民说马克思的道理，而只讨论农民的生活，耕多少地？打多少粮？交地主多少？剩下多少？够不够生活等，告诉他们怎样就可以有足够的饭吃，怎样就可以保住自己的生活不被剥去。农民在这样简单的宣传下，懂得了共产党，信任共产党了。”谢老看了这个牧师的评论后，在一篇《随记》里写道：“把我们的决议，不仅变成共产党所了解的东西，而且变成为广大群众所了解的东西，注意这个‘变’字。术语变为群众的话，理论变为具体的事实，远而普遍的事实，变为听者切身的

事实。面貌也许和决议全不相同，然而决议的实质已经被了解了。”

谢老不但从正面和反面论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而且从具体工作上讲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深入浅出，使人听得懂，记得住。在《怎样做县长》里，嘱咐干部：“不要跑得太远”，也不要“迁就落后”。当时陕甘宁边区正普及教育，谢老觉得普及教育是好事，但一定要注意：农民的子女要有饭吃、有时间读书；有足够的师资，如果不管这些，硬限定几年内要消灭文盲，要学龄儿童都上学，结果，入学成为人民的负担，而文盲依然如故。

谢老特别强调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要看材料，要去调查，“否则，有虚名而无实学，却在那里担负领导工作，是异常危险的。”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追述了毛主席在做调查研究工作时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一九二一年，谢老在湖南长沙主编通俗报，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找谢老谈天，谢老在《笔记摘录》一文中说：“我觉得他想了解我，态度谦虚，不即不离，人自乐于相告。”毛主席调查兴国、长冈、上杭、才溪，谢老同在一起，每个乡来乡长、支书两三个农民，谈个把星期，毛主席亲自照顾他们的食宿，生怕他们不能熬夜，一句句很谦虚地问，谢老很受启发。他在延安，常亲自下乡进行调查，他有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也占有大量的间接的调查材料，《一得书》七十一篇，都是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写出来的，这就是《一得书》的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谢老是严于律己的。他认为边区政权工作的领导机关，对边区内外的情形了解不够，自己思想也存在着“自以为是”的问题，他在《笔记摘录》里，做了大段的